



聂鲁达诗选

邹绛 蔡其矫 等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784.2/1

NIELUDASHIXUAN

聂鲁达诗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成都·

责任编辑：张 扬
封面设计：戴 卫

聂 鲁 达 诗 选

邹 绛 蔡其矫等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6.25插页12字数268千
1983年4月第一版 1983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书号：10118·692

定价：1.63元

往事·沉船·友谊（代序）

——忆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

艾 青

又一次打捞沉船的工作。

要从海底捞起一些零星的记忆，并不容易。经过海水的浸蚀，很多都已失去原有的光泽。

多少年来，我和世界是被隔绝了的。现在已经开了窗门，可以呼吸到外界的空气——开始有了互相透露一点真实情况的可能。许多事情又都涌现到我的眼前。

这些年，我对巴勃罗·聂鲁达的情况知道得很少。而我一直在系念着。有人告诉我，他曾对着大海呼唤我的名字。我们之间是有友谊的。我至今仍然感到珍惜。

据材料上说，聂鲁达1928年曾到过中国。

我最早认识他却是在1951年。那时，我们国家刚解放不久，还处于被封锁的孤独状态。我们多么

需要支持啊。聂鲁达怀着对新生的中国的热爱的心情，作为世界和大的代表，和爱伦堡一起，到中国来向孙逸仙的遗孀宋庆龄颁发列宁国际和平奖金（当时叫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我得到接待和陪同的任务。

我们相处有一周之久的时间。他对中国有着强烈的兴趣。我们除正式的集会之外，还有不少共同游览北京郊区风景名胜的机会。逛了颐和园，在“听鹧鸪”饮宴，还到过香山卧佛寺等地方。我曾送了他一本齐白石册页。我们有过多次随便的交谈——充满幽默和诙谐。那是一次愉快的交往。我们相处得很好。但爱伦堡曾对我们出于安全的原因不同意他们去东安市场一事很不高兴，聂鲁达是站在他那一边的。聂鲁达对我们那次接待工作是满意的。

我和聂鲁达的第二次交往是在1954年。那年7月12日是聂鲁达的五十诞辰。不知是谁发起的，利用这个日期，进行一次保卫和平的运动。我得到以智利众议院议长卡斯特罗的名义发出的邀请，去到圣地亚哥。同行的还有诗人肖三和当时的中联部副部长赵毅敏，加上翻译陈用仪。

当时，太平洋还没有通航，需要通过欧洲、非洲，才能到达南美，一路上有不少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些国家见我们如临大敌。然后经过

布拉格、日内瓦、里斯本、达卡、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到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一共飞行了八天。

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参观当地的名胜古迹，游历了瓦尔帕莱索海港，也到聂鲁达的海滨别墅去过，我曾在海滩上拣贝壳，到集市上去看土产。我亲眼看见了智利的劳动人民对他们自己诗人是如何的热爱和尊敬的。聂鲁达有着外交官的彬彬有礼的风度、诗人的天真的情感和民间歌手的纯朴的品德。他站在别墅门前，就仿佛远洋航轮上的大副。当地官方报纸说我们不是诗人，是做买卖的，因此我写了一些诗如《在海岬上》。在一个集会上女演员朗诵了一首我的诗，完了人们笑着对我说：你这个商人还能写那么好的诗啊！

那次去智利名义上是给聂鲁达祝寿，实际上也是想打通关系。我们送他的礼物是很重的。他也特意上街买了几个牛角杯送我们。

我和聂鲁达第三次会面是1957年，他和巴西作家亚马多从南美来，我到昆明去迎接他们。我们游逛了滇池，参观了富有亚热带风光的植物园，石林，一起去洗了温泉澡，然后坐飞机穿过五岭上空到了四川。在重庆，得到四川的诗人们的邀请，开了一个诗歌座谈会。接着坐轮船顺流而下，过三峡、汉口、……北京。在长江轮上，适逢聂鲁达生

日，船长送了他一个大蛋糕。这是他没有想到的，显得很高兴。

在北京，我个人曾请他吃了一次饭，聂鲁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们在世界上最独特的饭馆里吃饭（确实独一无二，那儿只有一张桌子），那家饭馆由皇家后裔经管。”

这儿指的就是二十多年前在新开路的一家私营的小饭馆“康乐”。当时他曾说这是他在中国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其实当时的“康乐”有三张桌子。

那时中国正在进行一次大的政治运动——反右斗争。聂鲁达走时，我没有去送行。从此我们没有再见面，我再也没有读过他写的诗。但他同我的感情是深厚的，一直关心我的行踪。

他曾竞选总统，以为很有把握，结果，没有选上。后来出任了驻法大使。当联合国大会讨论中国代表权的时候，智利代表在发言中还引用了聂鲁达歌颂中国的诗。

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出现了一些不容易为朋友们理解的事件。很多朋友和我们疏远了。

聂鲁达已于1973年9月23日逝世，这是我最近才知道的。

总之，对巴勃罗·聂鲁达，我是很尊敬的。他早期写的是格律诗，后来改写自由诗，比较好地发

挥了自己的才华。他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对世界人民有贡献。我以为他的作品，我们应当翻译、发表、出版。

现在我国正在增强与各国人民的交往。在相隔二十来年之后，聂鲁达的作品又开始介绍给我国的读者了，这是值得高兴的。

好象友谊也正在复活。

1980年初夏，北京

谈谈我的诗和我的生活

巴勃罗·聂鲁达

你们几乎人人都熟悉中央墟场。

我也熟悉。我曾经跟许多城里的人一起到那边去买西红柿、席子或是板凳。

这些好看的藤板凳，还有波迈雷和金恰马 里^①的黑陶器，现在都仍然在那边出售。再往 里 面 去些，可以看到一堆堆象高山似的卷心菜，象河流似的玉米棒子，象山脉似的马铃薯。

我是崇拜市场的。我一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到市场去。在马提尼克岛^②，在科伦坡，在雅加 达也是一样。热带的市场，正如热带的蝴蝶和诗人一样，使我们看见了不禁神往。

一切都发出一种强烈的色彩和刺鼻的芬芳。

① 波迈雷、金恰马里都是智利产黑陶器的地方。

② 马提尼克岛：小安的列斯群岛中一个法属岛屿。

不过，我们自己的市场虽然缺少这种热带的风光，但也有牢固而美好的宝藏，有南方土地和海洋的光荣的果实。

我承认，正如我们常做的那样，过去我也常常注目凝视我们中央墟场的鲜艳夺目的水果和蔬菜，却从来不看那里的男男女女。我从来没有注意到那一大群搬运东西的人，他们背着袋子上上下下，拥挤着，倾泻在这堆象教堂一样高的蔬菜旁边。

一直到1938年的一天，我才得到了一个启示，这件事我必须在这里坦白说出来。

当时我刚从西班牙回来。各处都邀请我去谈话，想听听我说些什么。这是一种好奇心，是智利人对一切都想了解，都想知道的这种可贵的、永不熄灭的好奇心。

冬天里有一天，我刚回家，又累又冷，打算躺在床上休息，可是就在这时候，我听见说某处地方正在等待着我，要听我讲话。

我立刻拿起了帽子和大衣，还拿起了最靠近手边的一本书。我把记上了地址的纸片交给一个朋友，他马上就把我送到了人们在等待着我的地方。

原来是中央墟场。我走进工会房子的时候，心里犹豫了好一会儿。我明白了，原来我来到了墟场的搬运工人当中，而我本来却没有准备同他们谈话。

这时候我的心情，跟有一次在马德里的心情一样，那一次，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加^①和我一起被邀请到大学去向文学系的学生们朗诵我们最新的诗句。费德里科已经仔细地准备了一篇介绍我的演讲词。我们走上讲坛的时候，发觉原来包围着我们的，并不是一群文艺听众，而是几百个预科的学生，他们吵嚷得乱七八糟。

费德里科站起来准备讲话，这时候他很快地向我耳边说了一句：“巴勃里托^②，多么乱糟糟呀。”

现在，我面前的是墟场的搬运工人，但这一次却没有和别人一起，无法向别人低声叹口气。

我在他们面前坐下来。我只拿着《西班牙在我心中》这本书。我当面看到了他们脸上粗迈的轮廓，看到他们支在长椅子靠背上的粗壮的手。他们身上几乎全都挂着袋子，当作围裙。长椅子下面，我看到了一堆堆的粗皮便鞋。

我想不出该跟他们说些什么才好。我于是开始把随身带来的书朗诵给他们听。我把关于西班牙战争的诗句念给他们听，我在这些诗句里，曾经注入了这样多的热情和这样多的创痛。我朗诵完一句又一句。最后几乎把整本书都念完了。

我从来不觉得《西班牙在我心中》是一本易懂

① 洛尔加：西班牙著名诗人和剧作家。

② 巴勃里托：巴勃罗的爱称。

的书。这本书的确包含了对人类世界，对苦难血腥的现实的关心。但是，隐晦的纠结，直到现在才开始剪开。

在那地方，那时候我明白了，必须跟某些成见一刀两断。

但是，我继续朗诵下去。我突然感到一阵可怕的空虚。搬运工人们静默地听着我。

没有跟我国人民接触过的人，是不会了解智利人的静默是怎样一回事的。这是彻底的静默，你根本没法知道这究竟是表示肃然起敬呢，还是表示坚决的责备。任何一个人的脸色都不会向你说明什么。你如果打算从他们的脸上，捉摸出一种浮现的迹象，那你就会茫然无所得。这是全世界最深沉的静默。这是一个回教徒冥想着沙漠时的那种沉默。

我把我的诗句朗诵完了。于是，在我的文学生涯中发生了最重要的一个事件。有人在鼓掌。有人垂下头来。接着，大家都把视线投向一个人，这个人也许是个工会领袖。他站了起来，也象别人一样腰上挂着袋子，两只大手支着椅子，瞧着我，对我说：“巴勃罗同志，我们是一些常常被人遗忘的人，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感动过。我们想告诉你……”

他一下子哭了起来，呜咽着。他旁边的许多

人，也在哭。我感到喉头哽咽着一种无法压抑的感情。

人们常在谈论诗究竟应该是这样还是那样，究竟应该带政治性还是不带政治性，应该是纯粹的还是不纯粹的。

我不会听这些讨论。我不能参加这些讨论。

我们这时代的修辞学和诗学，并不是从书本里来的。

它是从这些动人的集会里来的，在这些集会上，诗人第一次站到了人民面前。并不是没有人要求他一些什么。当我看到那些评论我的诗的言论时，我需要把许多的事实放在天平上。这些事实一一列举出来，那就太长了。

在这个天平上，有哪一页书能比这个动人的人类集会份量更重呢？

当时我开始思考，不光是思考到社会诗。我感到自己对祖国、对人民都负着债。

我关于《漫歌集》的第一个构思，只是打算写一本智利的诗歌，一首专谈智利的长诗。

我想在我本国的地理人情上展开主题，描写它的人和它的物产、它活生生的大自然。

但我很快就感到踌躇，因为所有智利人的根苗，都是伸展到地底下，然后再在别的土地上冒出

来的。奥伊金斯①在米兰达②身上有根苗。劳塔罗③跟夸乌特莫克④有血缘关系。奥阿哈卡⑤的陶器跟契扬⑥的黑陶都具有同样的漆黑亮光。

1810年是一个奇妙的年头。这是大家共同的年头，是到处爆发起义的一年，这一个年份，正象一件红色的反叛斗篷，飘扬在美洲所有的土地上。

当我路过上秘鲁的时候，我到库斯科⑦去，走上了马楚·比楚⑧。

我当时从印度和中国回来已经好些时候了，但是马楚·比楚在我看来却更加宏伟堂皇。

-
- ① 奥伊金斯 (Bernard O' Higgins, 1776—1864): 智利为摆脱西班牙而争取独立的战争中的将领，现被尊崇为智利的国父。
- ② 米兰达 (Francisco Miranda, 1756—1816): 委内瑞拉将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他曾参加援美的法军作战，后来又在法国参加革命军。1806年回美洲，1810年在美洲独立英雄博利瓦尔 (Simon Bolivar, 1783—1830) 协助下展开了委内瑞拉的革命运动。
- ③ 劳塔罗 (Lautaro): 智利从前南部领土上的印第安阿劳坎 (Araucano) 族的首领，以坚决抗击西班牙殖民者而著名。1557年被俘，乱箭射死。
- ④ 夸乌特莫克 (Cuauhtemoc): 墨西哥从前领土上印第安阿兹台克 (Azteca) 族最后一个皇帝。曾英勇抗击西班牙殖民者，1522年被俘，不肯说出宝藏所在地，被西班牙人酷刑杀害。
- ⑤ 奥阿哈卡: 墨西哥的一州。
- ⑥ 契扬: 智利的一个城市。
- ⑦ 库斯科: 前印第安印卡 (参见注③) 帝国的首都，现为秘鲁的一个城市。
- ⑧ 马楚·比楚: 印卡帝国建筑的遗迹。按: 1943年10月聂鲁达从墨西哥路经太平洋岸各国回到智利的途中，曾参观此处古迹。1945年8—9月间他以此为题材写了《马楚·比楚高峰》(Las Alturas de Macchu Picchu) 一诗。他在1946年致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的《全国文化杂志》的信中说: “这是我近来所写的最重要的诗。”

历史课本上记载的历代文明，都向我们谈到亚述，谈到雅利安人和波斯人，谈到他们规模宏大的建筑。

但是自从参观了马楚·比楚的遗迹之后，远古时代那些神奇的文化，在我看来，都只不过象是石纸板和硬纸做成的。

比起荒凉的印卡^①高塔那种傲然肃穆的神气，连印度在我看来也好象有些渺小，有点人工涂抹，有点平庸，象一个众神云集的大闹市了。

我再也无法离开那些建筑了。我理解到，既然我们踏着同一块祖宗相传的土地，我们就总是与美洲大集体过去那些崇高的努力有关系，我们不应忽视这些努力，我们如果无知或是沉默，这就不但是一种罪过，而且也是一个失败的继续。

贵族式的世界主义，曾经引导我们去尊崇最遥远的民族的过去，掩住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宝藏。

自从我参观古斯各之后，我想到了很多事情。我想到了古代的美洲人。我看到了他们古代的斗争跟现在的斗争联接在一起。

① 印卡：南美洲在西班牙征服者到达前即已存在的一个强大的印第安人帝国，成立约在公元8世纪，领土扩展到今天的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还有哥伦比亚、智利、阿根廷的一部分。印卡帝国后来被西班牙人灭亡。

于是我就开始产生一个构思，想写一本美洲的诗歌总集。过去我一直有一个念头，就是以史书的形式写一本智利的诗歌总集。那一次的参观把我的眼界改变了。我开始从马楚·比楚的高处看到了整个美洲。这就是我根据新的观念写成的第一首诗的题目。

我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逐步明确起来。那应该是一首地方性很浓的、局部性的诗。它应该是一种象我们各国地理一样片片断断的组合。大地应该经常不变地在诗里出现。

很久以后，我写了这首关于马楚·比楚的诗。这首诗是我的风格的一个新阶段和我的新意图的一个准备，因此它里面谈我自己谈得太多了。开头是一大串自传式的回忆。我当时也企图在那里面最后一次接触一下死亡的主题。在遗址的寂寞当中，死亡是离不开人们的思念的。

我是在黑岛^①，在海边，写下了《马楚·比楚高峰》的。

我跟人民斗争的接触越来越密切了。我理解到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史诗，这种诗不要迁就形式上的古老观念。我觉得一首带韵的、分成工整的六行一节的长诗，对于美洲的主题来说是不可能的。每一句诗必须带有这种错综复杂的土地的轮廓，一下子分

① 黑岛：聂鲁达的家，在离圣地亚哥不远的太平洋岸边。

裂为群岛，一下子又耸起，一下子又下降成为平原。

我一直在找时间写这本书。但这样做的机会却是一天比一天少。这些日子里，我们可怜的美洲所特有的迫害逆流，有一股到达了智利^①，这一次也轮到了我的份，我只好从一处流离转徙到另一处，以免被发现出来。

在我们大陆上，自由是一种奢侈品，它好象是一小片的旗帜，我们各国人民只是偶尔才能触摸它一下，但它马上又会随风飘走。

为了躲过迫害，我不能离开房间，而且常常要搬家。坐牢是有一定限度的，只要天天例行公事，最后牢总会坐完。但地下生活却更使人烦恼，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完结。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明白我写书的时刻来到了。我慢慢研究主题，安排章节，除了更换避难所之外，从不中断执笔。

在一年零两个月这种奇怪的生活当中，书写成了。把原稿运出国外，也成了一个问题。我加了一张漂亮的封面，上面不写我的名字。我添上了一个假书名：《笑与泪》，作者是贝尼格诺·艾斯宾诺萨。的确，这个书名也不错。

关于这本书，曾经发生过很多奇怪的事情。在我来说，六、七、八个钟头一口气不停地写诗，也是

① 指1947年智利总统魏地拉为美国收买，背叛人民阵线，迫害进步力量。